

兩個革命的對話： 1789 & 1911 (上)

• 孫隆基

一 前 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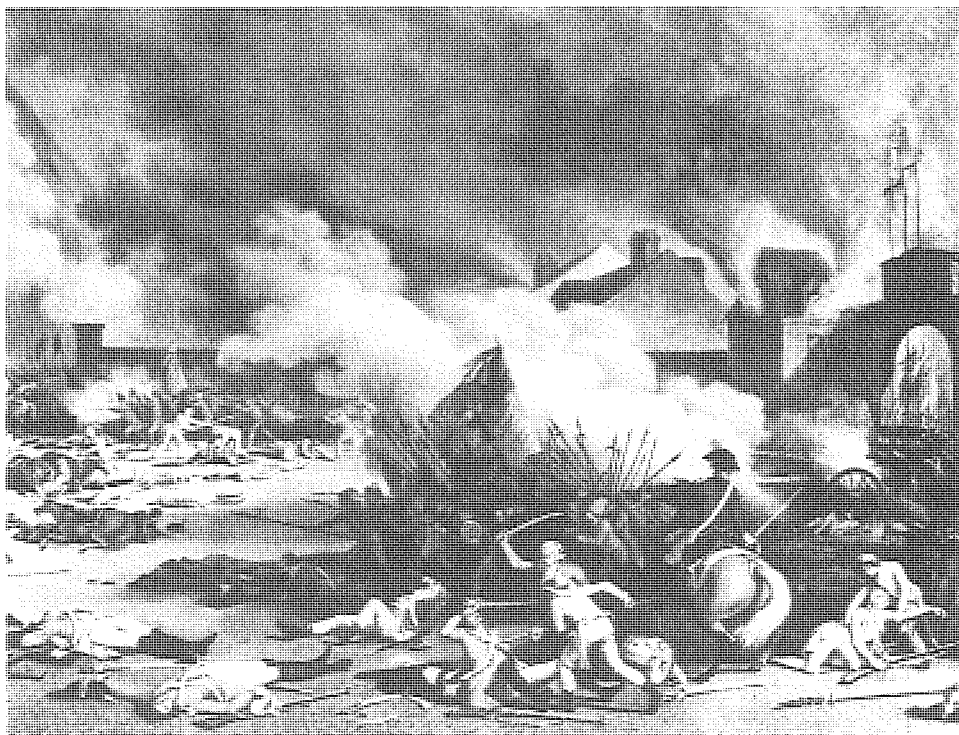
1912年，中國人成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。它具有強大的總統制，和美國的制度類似，它的內閣制則想仿照英國，建立在國會的多數黨之上。這真是冷英、美民主制度之精華於一爐。但中國的政治現實則是另一回事！在1913年，袁世凱總統派刺客把多數黨領袖、有望當內閣總理的宋教仁殺了。其後，袁世凱挑起內戰，鎮壓「二次革命」，想葬送民國，恢復帝制。這個拿破崙式鬧劇使初生的民國從此多事，長期陷入不穩定，以致對日本日益明朗化的威脅無招架之力。

中國現代化知識分子，在建國之夢被粉碎之餘，開始質問國民性是否基本上有問題。至1917年，他們的破舊運動，在一群北大師生大力鼓吹下，匯聚成「新文化運動」。新文化發出的聲音又被1919年5月4日愛國反帝運動的擴音器遠播四方，在中國思想界造成巨瀾。「五四運動」導因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之屈辱——中國明明是戰勝國，卻因國勢衰弱而遭戰敗國待遇。此時，俄國「十月革命」已於1917年爆發，因巴黎和會而對西方失望的中國知識分子，有一大部分轉向新生的蘇聯。至1921年，在共產國際扶植下，中國共產黨成立，其領導人物就是新文化領袖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。這一連串歷史事件的發展，令毛澤東在1940年回顧地總結：「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，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，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。」^①

毛澤東的聲音雖具無比權威性，但五四知識分子心目中與中國現況相關的革命，該不是俄國革命，而是法國大革命。事實上，俄國革命發生後數年，因為列強對新生的蘇俄之封鎖，中國對其消息仍十分不靈通，透過西方傳媒所記者盡是對俄國「過激黨」的歪曲報導。遲至1920年，北京《晨報》還必須派一名通

毛澤東認為五四運動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發生的，但五四知識分子心目中與中國現況相關的革命，該不是俄國革命，而是法國大革命。

* 本人曾用同標題發表英語論文，內容不盡相同，詳註^②。



本世紀初，中國知識分子對法國大革命評價不一，這種分歧見於維新派與革命黨的論爭之中。

訊員穿越戰火漫天的西伯利亞，常駐莫斯科，以便對俄國革命作第一手報導，這與當時法國已有大批「勤工儉學」的華人不可同日而語。五四時代對法國大革命熟悉的程度無疑遠勝於俄國革命。發生於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，至十九、二十世紀仍餘波蕩漾，也該比剛發生、前途未卜的俄國革命累積了更深廣的歷史透視。因此，民初中國人談中國革命常用的諷喻該是法國大革命。

二 清末維新派與革命黨的「法國大革命」觀

俄國革命在1917年才發生，但在民初，中國人談法國大革命已有十年以上經驗。最早談法國大革命的是曾兩度遊歷法國的王韜，他根據兩部日本著作，於1871年編成《法國志略》一書，第一次簡略地介紹了法國革命始末^②。但王韜長期在香港當記者，他談法國革命在當時是一個孤立事件。中國人談法國革命之形成思想傳統，實導源於清末維新與革命之爭。

根據康有為《自編年譜》所述：他曾於戊戌年(1898)進呈清帝《法國變政考》一書，在他的《戊戌奏稿》裏則記載為《法國革命記》一書。其中有「流血遍全國，巴黎百日而伏屍百九十萬，變革三次，君主再復，再綿禍八十年。……革命之禍，遍於全歐，……而君主殺逐，王族逃死，流血盈野，死人如麻」之語。康的記載很可能是一個存心的時代錯誤。有學者認為：康之論說「似乎不像是戊戌年間啟發光緒憤發變法，倒像是在辛亥革命風暴來臨之前，康有為咒詛革命的言辭」，並斷言該書未曾向清帝呈遞^③。

1890年代的維新派是民主派，他們的公羊三世說認為英、美等國實行民主制，已經進入「太平世」，而中國的君主專制還停留在「據亂世」。因此，康有為

俄國革命在1917年才發生，但在民初，中國人談法國大革命已有十年以上經驗。中國人談法國革命之形成思想傳統，實導源於清末維新與革命之爭。

當無猛烈攻擊法國大革命之理。在庚子年間(1900)，保皇會支持被囚禁的光緒帝，甚至想在長江中游舉行武裝起義，也不像是反對暴力革命。

維新派開始負面地看待法國大革命，該是其意象被革命派佔用了以後之反應。1901年，革命派在東京的報刊《國民報》主張中國人該學習法國革命：

昔者法蘭西之民，受君主壓制之禍為最慘酷，十八世紀之末，大革命起，倡自由平等主義者，聲震全歐，列國專制之君聞聲震駭，……一千八百三十年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，法國復大革命，影響所及，列國民主黨，一時並起，謀覆專制之政府，有沛然莫禦之勢。

於是歐洲各國相繼「本民主旨義，立憲法、開議院」，作者認為本此途徑，「我國民可興矣」^④。激進派雜誌上，亦開始宣傳法國大革命及由其肇始的整個十九世紀革命時代^⑤。

1906年，康有為在《新民叢報》上發表〈法國革命史論〉。其中針對當時清廷將開議院，以古為鑒地說：「法之召大亂也，以初開議院之制未善也。」康仍存把共和等同於「大同」之思想遺迹，認為法國大革命「其要旨曰人權平等也，主權在民也，普通選舉也，此至公至平之理，聖者無以易之，實大同世之極則也，然孔子早明太平之法，而必先以據亂世、升平世，乃能致之。」法國革命實行時代不當，結果「凡預於革命之役，無仁、暴、智、愚、賢、不肖，無一人能免者，百二十九萬人，流血以去一君，卒無所成，只助成武人拿破崙為大君，復行專制而已。」^⑥

康對「恐怖時代」的描繪後來成為對該時代的標準敘事，甚至為李大釗等人沿用，值得節錄在下。在康眼中，革命暴民「乃燒宮殿、破鏡器、焚古書、毀寶物、發陵廟、掘諸名相之墓、焚寺社、毀第宅，法國千年之寶盡矣」。康又極度渲染革命政府對保皇的旺代(la Vendée)郡之血腥鎮壓^⑦：

拉枉德州人八十萬，歲為勤王之舉，且守教甚篤，與革命黨不共戴天。……革命軍以廿萬大兵破之，……尚以行刑遲煩，置囚於大溺舟而沉之，名曰革命宣禮式〔指洗禮〕，或對綁合年男女投水中，名曰革命結婚刑，凡合刑、水刑死者一萬八千餘，此外死者三萬餘，河流皆臭，二百里間水赤，鳥雀集啄人屍，魚含毒不能食，舟夫拔錨多獲屍。……

革命派機關報《民報》指出〈法國革命史論〉表現「尊君之心理」^⑧。這個批判基本上不誤，但亦必須指出：康在該文裏並非全面肯定法國舊王朝，亦同情在「恐怖時代」被山岳黨(the Mountain)清算的革命派紀朗德黨(the Girondins)：「是時法國革命之志士，才英民望，一朝盡矣。全法之八十六州，皆歸心及倫的黨者也。……〔及山岳黨興，〕於是法革命正黨及倫的終，而法之恐怖時代出，大亂綿於八十餘年，流血至於數千萬人，不亡國幾希。」紀朗德黨之失敗，康歸咎於「不忍人之心」，完全缺乏社會力的分析：「故當大變，非常仁柔之君子，必以猶豫不忍敗，悍毒之奸雄，必以凶忍捷疾勝。」^⑨(康到了民國時代創辦一

1906年，康有為在《新民叢報》上發表〈法國革命史論〉。康對「恐怖時代」的描繪後來成為對該時代的標準敘事，甚至為李大釗等人沿用。

份反對民國的雜誌就叫做《不忍》。)他稱「山岳黨」為「屠伯」，影射孫中山革命派為暴徒。

維新派之與紀郎德黨認同，亦浮現在梁啟超1902年歌頌羅蘭夫人(Madame Roland)一文。羅蘭夫人為紀朗德黨領袖之一，在「恐怖時代」被送上斷頭台，臨刑前曰：「嗚呼！自由自由！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，假汝之名以行！」^⑩我們應該這樣看問題：當時的革命、維新兩派都是激進派，都是被清廷通緝的要犯，因此並非左派右派之分，如果用現代名詞勉強稱之，不妨把革命派稱作「極左派」、維新派稱作「中左派」。

三 法國大革命與國民性

1903年以前，梁啟超搖擺在維新與革命之間，一方面與孫中山派暗通款曲，另一方面又受乃師康有為壓力留在保皇會內。在1902年，梁歌頌法國革命女傑羅蘭夫人之餘，亦把法國大革命當做反面教材，提出革命是否適合國民性的命題。「國民性」的討論已明顯擺脫公羊三世的普遍進化階段論^⑪：

法蘭西人……百年之內，變政體者六，易憲法者十四，至今名為民主，而地方自治與個人權力毫不能擴充，此拉丁人所以日蹙於天演之劇場也，若夫條頓人，則其始在日爾曼森林中，為一種蠻族時，其個人強立自由之氣概，傳諸子孫而不失。……盎格魯撒遜人之尤優於他條頓人者何也，其獨立自助之風最盛。

梁啟超在1903年寫道：「〔法國〕其國民之性情，乃與共和主義最不相容。……自治者，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條件也，而法人曾無所練習，百事皆仰賴政府。」其弦外之音暗示中國國民性亦不宜實行民主共和。

他在1903年又寫道：「〔法國〕其國民之性情，乃與共和主義最不相容。……自治者，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條件也，而法人曾無所練習，百事皆仰賴政府。」^⑫其弦外之音暗示中國國民性亦不宜實行民主共和。

梁的說法明顯地受到主「國家有機體說」的瑞士學者伯倫知理(Johann Kaspar Bluntschli)影響。梁把一個比喻當做邏輯推論：「凡有機體之發達，必經自然之順序，歷爾許之歲月，又無他種故障以夭摧之於中途，夫然後繼長增高以底大成。……泰西史家言法蘭西當大革命時代，全國所產嬰兒，率多癩癩，社會之現象，遺傳於其群眾之心理中者，如是其可畏也。」^⑬這裏亦多少反映當時流行的後天特徵可遺傳的拉馬克生物學理論。

其時，社會心理學亦在西方與日本抬頭，有學者認為它與國家有機體說打對台。其實兩者並非完全劃清界線，在思想博雜的梁啟超身上尤其劃不清。梁除了國家有機體說之外，還大量引用當時流行的社會心理學說。在西方，社會心理學興起於十九世紀末，至世紀之交大盛於日本，旅居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則轉從日本處受到影響。當時社會心理學着眼的是「集體心理」(the group mind)。這個概念到了二十世紀20年代，受到新興的行為主義批判才衰落。因此它可以說支配了維新、革命之論爭，下及五四思潮。當時集體心理學用人與人之間的「暗示」(suggestion)、「模仿」(imitation)、「同情」(sympathy)來解釋集



呂邦的群眾心理學理論，在20年代以前的中國曾被廣泛援用。

體心理的形成。它很重要的一個分支就是國民性研究，主要流行在德、法兩國，在德國叫做Völkerpsychologie，在法國叫做psychologie des peuples，英語裏則翻成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 或 racial psychology，到了中國，就變成「國民心理學」，並由此衍生「國民性」一詞^⑭。

集體心理學泰斗是法國的呂邦(Gustave Le Bon)，著有發揚國民心理學的《民族進化的心理法則》(*Lois Psychologiques de l'Evolution des Peuples*, 1894)，並著有《群眾心理》(*Psychologie des Foules*, 1895)以及《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》(*La Revolution Franc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evolution*, 1912)。三書都拿法國大革命印證群眾心理之非理性和革命心理之暴虐。呂邦是法國第三共和時代的保守派，他悲嘆普法戰爭中法國的敗績，尤其對戰敗期間「巴黎公社」暴動反感。他想用學說鞭撻國民劣根性，並把法國政局長期不穩定歸咎於法國大革命，認為正是法國人劣根性造成暴民政治和拿破崙主義的惡性循環。中國人在呂邦的「科學性」權威性籠罩下談法國大革命，其實乃透過第三共和時代保守派觀點看該革命^⑮。

中國人在呂邦的「科學性」權威性籠罩下談法國大革命，其實乃透過第三共和時代保守派觀點看該革命。

呂邦在今日已被人遺忘。中、日學者收集近百年來中國有關法國大革命的史學項目，也把他遺漏了。顯然，他們只着眼於「史學」，完全忽略了當時流行過一陣子的「國民心理學」，以及被它影響的各個方面的論說。

1903年，《新民叢報》連載梁啟超胞弟梁啟勳的〈國民心理學與教育之關係〉一文，介紹「法儒李般Le Bon氏所著國民心理學*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*〔筆者按：《民族進化的心理法則》一書之英譯〕。」^⑯該文時代背景是科舉制度將廢

前夕的「國民教育」討論。大家都把改造國民性寄望於國民教育，梁啟勳遂指出國民性極端之易塑造，並引法國大革命為例：「若國民議會時代（即大革命時代）之法國人其殘虐若彼，拿破崙帝政時代之法國人，其順良又若此，前後不及二十年而截然成反比例。」^{①⑦}但呂邦的原意是國民性極端難塑造，他舉出山岳黨專政時代的暴民政治與拿破崙時代的順民政治，為了說明同一個國民劣根性的兩個面相。

同時期，梁啟超本人也提到呂邦。1903他遊北美，有感於唐人街之凌亂程度冠於全球，「即李般所謂國民心理，無所往而不發現也。夫以若此之國民，而欲與之行合議制度，能耶否耶？」^{①⑧}梁的〈新民說〉中有一整段例子來自呂邦《民族進化的心理法則》一書中的一段^{①⑨}。呂邦認為拉丁民族不如英美民族優秀，因此英美民族可以實行議會政治，拉丁民族的共和國徒然製造混亂，梁對此完全同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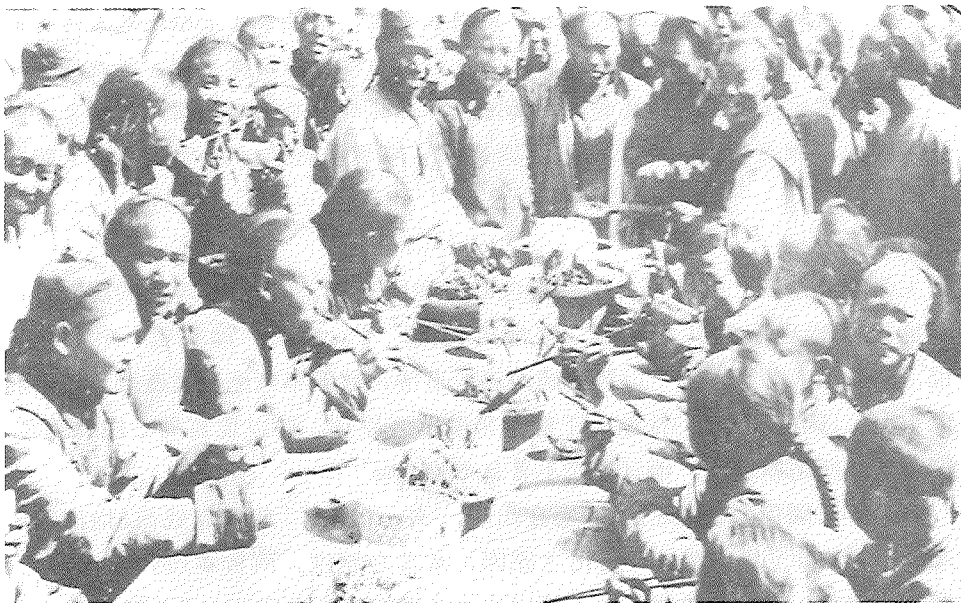
此時，國民心理學被維新、革命兩派廣為運用。梁啟超的同志蔣觀雲在《新民叢報》上連載了〈共同感情之必要論〉與〈論中國人崇拜岳飛的心理〉^{②⑩}。前文用社會心理學的「同情」概念說明現代國家必須以共同心理為基礎。後文用類似「暗示—模仿」論的分析指出：中國民眾對岳飛的英雄崇拜有助於民族主義之發揚。岳飛乃抗女真的英雄，因此蔣氏此文顯示出《新民叢報》上亦有排滿情緒。至於革命派訴諸國民心理學說則更明顯。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朱執信提出「心理的國家主義」，和梁啟超的國家有機體說打對台^{②⑪}。當時還沒有「民族主義」一詞，因此「心理的國家主義」這個古怪名詞就是指民族主義。《民報》第24號〈革命之心理〉一文，則鼓勵用暗殺手段振奮「病幾彌留、不可救藥」的「國民心理」^{②⑫}。後來日本當局以該文為藉口把該刊查禁。

同盟會的汪精衛用社會心理學論證國民性可藉革命而更新：「夫國民所持以為國者有二，一曰歷史，二曰愛情〔即sympathy，一般作「同情」〕，因歷史而生愛情，復以愛情而造歷史，蓋國民固有歷史的遺傳性，然必其所際遇，與古人同，然後樂於因循，若其遭值者，世局人心，均開前古所未有，而外緣之感觸，有以濬發其愛情，則因比較心而生取舍心，因取舍心而生模仿心〔指imitation〕，其變至繁，其進必烈。……是唯當濬國民之愛情，以新國民之歷史。求所以濬其愛情者，自心理以言，則為教育，自事實以言，則為革命。」但國民心理學泰斗呂邦把革命說成很可怕。汪對「革命」就不得不有所辯解：

願教育為眾所咸避，而革命則有遲疑不敢額者，以謂革命之際，國民心理，自由觸發，不成，則為恐怖時代，即成矣，而其結果奚啻不如所祈，且有於所祈相違者，求共和而復歸專制，何樂而為此耶？

汪精衛指出美國革命產生華盛頓，而法國革命則造成拿破崙稱帝，乃因國情不同所致。按此邏輯，中國的國情應當會產生拿破崙才對，但汪筆鋒一轉，認為革命派可以制定「約法」防止它：「其樞機所在，為革命之際，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。」^{②⑬}換而言之，汪的「國民心理學」不得不訴諸唯意志論，正如他所說：「蓋社會心理常為事實之母。」^{②⑭}

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朱執信提出「心理的國家主義」，和梁啟超的國家有機體說打對台。當時還沒有「民族主義」一詞，因此「心理的國家主義」這個古怪名詞就是指民族主義。



梁啟超等人指出共和政體與中國國民性相柄鑿。

汪氏之國民心理學的確能把滿州「異族」排除在漢人「共同感情」交流範圍之外。至於國民革命是否符合「國民心理」，汪似乎訴諸法國革命派的邏輯：唯有革命行動方能解放被專制君主壓抑的「公共意志」，因此革命行動本身就是國民共同感情之母。汪說：「疇昔吾國民有國民思想矣，然專制之毒，足以摧抑之，有民族思想矣，然君臣之義，足以剋滅之。今欲使國民心理發達變遷，則當葆其固有者而去其沮遏者。去沮遏之道，在聲專制君主政體之窮凶極惡。……而國民思想、民族思想，則我民族之所固有者，在發揮光大之而已。使民族主義國民主義而大昌明也，則〔革命〕約法者，乃應於國民心理之必要，而不能不發生者也。」^②法國大革命之具備此功能似乎乃激進派共識。早在1903年，同盟會成立以前，留日學生雜誌《浙江潮》已有文章指出「民族主義」乃「法國大革命」和「拿破崙」之「產物」^③。

梁啟超答辯革命派，與法國革命時代英國反革命思想家布爾克(Edmund Burke)同調，亦即主張任何變革都不應急驟，必須是符合歷史傳統的漸變。梁指出：在現階段，共和政體並不適合中國國民心理。從此前提出發，梁指責汪「所以為標準者，實外國心理，非本國心理」，並警告「專以感情論投合社會，非社會之福，而社會之禍也，法國其前車也」^④。

梁啟超答辯革命派，與法國革命時代英國反革命思想家布爾克同調，亦即主張任何變革都不應急驟，必須是符合歷史傳統的漸變。

四 中華民國與法蘭西共和國

民國成立之年——1912年——前清時代曾為上海立憲派機關報的《東方雜誌》發表總編輯杜亞泉的〈共和政體與國民心理〉一文，謂：

國民心理者，社會心理之表現於一國國民之間者也。……各國國民，皆各有其特殊之性質，彼此不能強同，是即所謂國民心理。……吾國民重事實而忽原理，……美國法國之革命，皆以理想為之先驅，革命之後，政體遂

變。我國之革命，自湯武以來，無慮數十次，僅於事實上驅逐暴君污吏而已。……論者每謂現今吾民國政治上，兵馬權重而法律權輕，行政權重而立法權輕，與法美諸共和國之政治，頗異其趣，而予則以謂此等現象，殆國民心理之所構成。……然兵馬之權，事實上之權，法律之權，原理之權。

杜主張調和兩者，締造符合中國特色的共和國：「……吾中華現實的國民，自不能以純粹理想的共和政體，移植於其間。……雖然，理想者，事實之母也……吾國人藐視理想，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，數千年來進步之遲緩，概由於此。……〔因此，必須〕採歐人千餘年來發明之原理，而以現實的心理陶鑄之，則今日之所謂原理者，他日未必不著為事實。」²⁸

翌年，國民黨的《民立報》上亦出現一文，指出：「昔吐克威爾〔指法國的 Alexis Tocqueville〕謂一國進化之原因，當求之制度，而魯本〔呂邦〕氏非之，以為制度者，進化之結果，非其原因也。各國有特殊之民性，發而為特殊之制度者，於以成其特殊之文明。文明之肌髓、制度之精神，蓋深蘊於其積千數百年相累而成之國心民心理組織。故文明不可假借。」該文不可免地以法國為參考：

吾為共和國，法又一共和國，則吾之民性，又猶法之民性歟？……〔如果中國〕現行法國制度，其精神不特與拿破崙時代無異，亦且與路易十四時無殊。

在「二次革命」期間，袁接受西方記者訪問，後者問他是否想仿效拿破崙，袁回答說：「余欲為華盛頓，非拿破崙也。」

該文亦暗諷當時正進行中的墨西哥革命，並顯然運用呂邦的拉丁民族政治不上軌道的論說：「若夫學步邯鄲，效顰西子，驚虛名而受實禍者，則有南美諸共和國在。……南美諸國以拉丁民族而採用英國民族之制度，致與其民性相戾故耳。」但該文不願過份悲觀，因此仍得出締造具中國特色的共和國之結論：「民性為我所獨具，則制度不妨為我所獨創。」²⁹

但前立憲派和前革命派如此唱和，不啻對中國「國民心理」是否適合共和政體提出大大的問號。「國民心理」乃萬靈丹，贊成民國者可把共和政體說成符合「國民心理」。反對民國者亦可把共和政體說成與「國民心理」相鑿，甚至同一個人可在不同場合把它作因時制宜的運用。至於法國大革命這個諷喻，也同樣地被「各取所需」。

民初逃避不了法國革命這個諷喻。1912年，袁世凱與同盟會（後改組為國民黨）因內閣問題起衝突，南方各大城市報紙普遍譴責他破壞法制，甚至含「效法拿破崙推翻共和國的野心」。袁於1913年3月派兇刺殺宋教仁，觸發國民黨的「二次革命」。在這段期間，袁接受西方記者訪問，後者亦問他是否想仿效拿破崙，袁回答說：「余欲為華盛頓，非拿破崙也。」至下半年，袁消滅南方的革命派實力，至1914年中，又消滅在北方響應「二次革命」的白朗起義。革命黨勢力之敗滅為帝制復辟清除了道路，一班清廷遺老不明袁之意向，以為回朝時刻來臨，蠢蠢欲動。袁不得不於11月下令「申禁復辟邪說」，痛斥遜清復辟分子昧於

「世界大勢」與「國民心理」。至1915年，袁以自己稱帝時機成熟，於是袁政府開始發出一些奇談怪論。10月間，袁氏「因墨國亂事〔指墨西哥革命〕，亦以為強行共和非永久之計」，其政府操縱國民會議「響應」國民請願變更國體，說：「此次國體請願……已足徵國民心理之所同。」又以當時進行中的墨西哥、葡萄牙兩國革命造成之亂勢作「國體不宜」的反面教材。但袁登基前夕，爆發了雲南蔡鍔的護國軍起義。12月29日，袁以「民意」名義討伐，公告說：「主張君憲正為我國民真正心理之表現，……去共和之餘毒，復古國之精神，使此後海宇晏安，定於一統。」^⑩

袁世凱稱帝不得人心，雲南起義一聲炮響，南方獨立，眾叛親離。連鎮守南京的北洋台柱馮國璋將軍亦於1916年4月16日通電袁，暗示他下台。他以袁記國民心理學之道，還治袁氏本人：「默察國民心理，怨謗尤多，語以和平，殊難饜望。實緣威信既墜，人心已渙，……」勸他的老上司最好「急籌自全之策」^⑪。袁終於憂憤而死。

袁鎮壓「二次革命」期間，宣佈國民黨為非法亂黨，在國會另以湯化龍、梁啟超新組的進步黨代之，並讓該黨組內閣。梁自清末以來，一直用「開明專制論」抵制革命思想，至民初則主張中央集權，反對國民黨的地方分權論，因此與袁世凱的大一統構想合拍。梁於1913年6月在《庸言》上發表〈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〉一文，批判國民黨「二次革命」，自然又脫不了法國大革命的諷喻^⑫：

自民國建號以來，僅十餘月，而以二次革命聞者，幾於無省無之，其甚者則三四次（如湘如蜀），乃至七八次（如鄂）。最近則江西之叛〔指李烈鈞起義〕，尤其彰明較著者也。……夫言革命言共和者，必以法蘭西為祖之所自出。然法國自大革命以後，革命之波相隨屬者互八十年。其最初之十餘年間，則丹頓〔Danton，一般譯作旦東〕、馬拉〔Marat〕、羅拔比爾〔Robespierre，一般譯作羅伯士庇〕、拿破崙迭擅神器，陷其國於恐怖時代者逾一紀。後此中美、南美十餘國踵其轍，……最近則墨西哥兩歲之間，三易其元首矣。

但這段話微妙之處，在用「山岳黨」影射國民黨之同時，也攻擊「拿破崙」。梁支持袁統一國家，但並不支持他的帝制復辟。當袁的稱帝野心於「二次革命」後趨於明朗化，梁就和他的學生蔡鍔密謀倒袁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

① 〈新民主主義論〉，《毛澤東選集》第2卷。

② 張芝聯：〈近百年來中國的法國革命史學〉，《歷史研究》第4號（1989.8.15），頁32-33。

③ 孔祥吉：《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388-89。

④ 〈二十世紀之中國〉，張彤、王忍之編：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1卷，上冊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62），頁70。

⑤ 例如《游學譯叢》第12期（1903年）上的〈十九世紀歐羅巴歷史之壯觀〉。

- ⑥ 明夷(康有為):〈法國革命史論〉,《新民叢報》第85號(1906.8.20),頁1、3、15。
- ⑦ 明夷:〈法國革命史論(續第八十五號)〉,《新民叢報》第87號(1906.9.18),頁2、4。
- ⑧ 寄生(汪東):〈正明夷法國革命史論〉,《民報》第11號,頁1。
- ⑨ 明夷:〈法國革命史論〉,頁10-13。
- ⑩ 〈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〉,《飲冰室合集》(北京:中華書局,1989)第6冊,《飲冰室專集》之十二,頁1。
- ⑪ 中國之新民:〈新民說——第四節: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其取法之所宜〉,《新民叢報》第2號(1902.2.22),頁6。
- ⑫ 〈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〉(1903.5.25),《合集》第2冊,《飲冰室文集》之十三,頁78。
- ⑬ 中國之新民:〈新民說:第十九節——論政治能力〉,《新民叢報》第49號(1904.6.28),頁10、11。
- ⑭ 詳本人Lung-kee Sun:“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”, *Modern China*, vol. 18, no. 3 (July 1992).
- ⑮ 細節詳本人Lung-kee Sun:“The Dialogue Between Two Revolutions: 1789 and 1911”, *Republican China*, vol. 17, no. 1 (Nov. 1991).
- ⑯ 〈國民心理學與教育之關係〉,《新民叢報》第25號(1903.2.2),頁1。
- ⑰ 〈國民心理學與教育之關係(續第25號)〉,《新民叢報》第30號(1903.4.26),頁1。
- ⑱ 〈新大陸遊記〉,《新民叢報》特刊(1904.2),頁188、190。
- ⑲ 見註⑬,頁2。呂邦相應的一段文字見於Gustave Le Bon: *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*, translator unknown (New York: Stechert, 1912), pp. 33-34。
- ⑳ 前文連載於1904、1905年間第47至60號,後文載於1906年第72號,皆署名「觀雲」。
- ㉑ 懸解(朱執信):〈心理的國家主義〉《民報》第21號(1908.6.10)。
- ㉒ 伯夔:〈革命之心理〉,《民報》第24號(1908.10.10),頁10。作者為湯增璧。
- ㉓ 精衛:〈民族的國民(其二)〉,《民報》第2號(1906.1.22),頁19-22。
- ㉔ 精衛:〈民族的國民〉,《民報》第1號(1905.11.26),頁19。
- ㉕ 精衛:〈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〉,《民報》第4號(1906.5.1),頁15。
- ㉖ 余一:〈民族主義論〉,《浙江潮》第1號(1903.2),頁17-18。
- ㉗ 飲冰:〈答某報第4號對於新民叢報之駁論〉(1906.4.24),《合集》第2冊,《文集》之十八,頁80、81。
- ㉘ 儉父(杜亞泉):〈共和政體與國民心理〉《東方雜誌》第9卷第5期(1912.11.1),頁1-4。
- ㉙ 不署名:〈制度與民性〉,《民立報》1月5日,轉載於1913年《民國彙報》,頁8-9,收錄於秦孝儀主編:《中華民國史料叢編》A27(台北:1976)。
- ㉚ 李宗一:《袁世凱傳》(北京:中華書局,1980),頁214、250、301、328、334、351。
- ㉛ 引自劉厚生:《張謇傳記》(香港:龍門書店,1965),頁229。
- ㉜ 《飲冰室合集》第4冊,《文集》之三十,頁51-52。

孫隆基 浙江人,生於重慶,在香港長大,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赴美,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及史丹福大學之碩士及博士學位,曾任教於坎薩斯大學、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和加拿大阿爾拔塔大學,現任職於田納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學。著有《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》一書,備受學術界及社會注意。